

11/11/1

庆元纵横



210 88

3

Qingyuan Zongheng

政协庆元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议 政 篇	致读者	编 者 (1)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我县第一个党支部和	
	村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陈明赞 张 树 (2)
	石抹宜孙在庆元的最后搏斗	
	——发生在元明交替的历史事件	吴 升 (4)
	庆元交通概况	刘化涛 (6)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党政军关系	郑可建 (9)
	追源溯流话青瓷	克 冲 (11)
	我对发展庆元工业的看法	俞向东 (13)
经 济 纪 实	补天阁的命名 (补白)	(15)
	建立系列服务机构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孙尚志 (16)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应是我们的长期战略思想	朱献龙 (18)
	九年改革怎么样	县农牧特产局等 (20)
	曹岭过塘行	何 须 (22)
	庆元建行大力开拓	
	存贷结合的各项储蓄业务	本刊记者 (25)
	改革给庆元造纸厂带来了生机	陈 青 (26)

姚文宇和罗教“一字门”……………姚德泽(27)

蒙 一支御匪保乡的地方武装

州 ——民初十八社联甲简介……………逸 夫(30)

旧 八角殿的枪声……………叶积夏(32)

事 庆元育婴堂史略……………吴引年(36)

竹口民教馆始末……………吴 藩 吴 越(37)

桃李芬芳话县小……………赖善卿(39)

教 省基础教育先进乡——岭头乡……………张慕载(41)

育 庆元图书馆史略……………夏良友(42)

今 庆元的女子教育……………家 儒(44)

昔 对发展幼教事业之我见……………吴应兴(45)

回忆童年在私塾……………蔡建年(48)

刘恒恕(附刘恒忠)……………绛 凌(49)

人 物 姚安世……………朝 华(50)

春 秋 不同流俗 不容于世

——《姚安世传》读后……………荒 原(51)

风云录 共产党员、民政局副局长姚德绍二三事……………徐赞海(52)

社 会 如何发展村级经济

调 查 ——岭头乡杨家庄村已作出答复……………胡兆行(54)

大家谈 小议“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林 非(55)

香 菇 之 乡	庆元香菇厂简介·····	吴 嵩 (56)
	草菇生产 前景广阔·····	吴锡鹏 (57)
	大坑——香菇专业村·····	鹤 楼 (58)
乡 镇 介 绍	石湖乡·····	本刊编辑部 (60)
	石湖乡主要地名简介·····	本刊编辑部 (61)
	贤良新貌·····	本刊记者 (62)
	勤耕苦学出人才·····	文 斯 (64)
	富在深山有远亲·····	老 叶 (65)
地 方 名 产	竹节人参·····	云 石 (66)
	伸筋草·····	吴金灿 (67)
	我县最年轻的县官 (补白) ·····	(67)
地 名 趣 谈	留香后世·····	笛 鸣 (68)
	后 楼·····	群 青 (68)
艺 海 拾 贝	左溪河畔话古樟·····	叶增飞 (69)
	祖国疆土百业兴·····	黄金镇 (70)
	梨园趣话·····	姚德安 (71)
	青樵癫·····	蝉 声 (73)
	炊烟·····	谢 乙 (73)
	蒙州好 (调寄《忆江南》) ·····	镜 山 (74)
	松源好 (调寄《忆江南》) ·····	郑岩星 (76)
	兰溪桥水库 (七律) ·····	笑 山 (76)
	烧梅和梢梅·····	东方白 (77)
	庆元近代三位打虎英雄 (补白) ·····	(77)
	盼三通 (调寄《荷叶杯》) ·····	吴朝仪 (77)
	百山祖览胜·····	颍 川 (78)

史 随	从《苏谈·刘守镇讹言》谈起……………王西金 (80)
团 笔	以犬为名 认树为父…………… 蠢 老 (82)
庆 元	抢“袖灯”……………可 聪 (83)
风 俗	庆元丧葬古俗…………… 吴辰年 (84)
大事记	(共九则)…………… (87)

庆元纵横

第 3 期

编 辑：《庆元纵横》编辑部

(地址：庆元县府大院内)
(电话：4 7 9)

顾 问：梅显恒

主 编：余 绪

本期编辑：赖善卿 吴 升 王西金

装帧设计：吴 升

照相制版：松溪县印刷厂

发 行：政协庆元县文史办公室

印 刷：松溪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1 9 8 8 年 3 月 1 5 日

致 读 者



岁月匆匆，当您收到这期饱含油墨香气的《庆元纵横》时，已属龙年，我们在此寄语一句：愿您在这龙腾虎跃的年代里，大显英雄本色。

《庆元纵横》（前称《庆元文史》）创刊于1984年10月。那时，莽莽百山祖的千山万壑，正滚动着改革的阵阵春雷。这雷声，喊醒了沉睡的乡土，振起了困倦的人民，大家挥动铁臂，铺开画卷，在大千世界中尽情地播种、耕耘、收获，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令庆元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处处春意盎然！

《庆元纵横》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脱颖出来的。所以她一开始就注意认真、翔实地做好史料的征集工作，积极报道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对于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也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我们深深感到，是党的光辉政策和人民群众的无穷创造，才使我们得以放开手足，拓宽视野；才使我们得以有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泉源。

然而，我们断不敢妄言自己的工作已经做得如何如何。《庆元纵横》无论是在内容上或者是在稿件质量上，肯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这除了囿于编辑人员的水平之外，跟我们工作过多，很少深入基层有关。在这方面，今后我们还必须大力改进。

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编辑和作者、读者，是鱼水之交。一旦离开了他们的监督和关怀，就如缘木求鱼，一无所得。愿《庆元纵横》这朵小花，在大家的关心培植下，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编 者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我县第一个党支部和村
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陈明赞 张 树

在我县东部与本省景宁、闽省寿宁接壤的边境上，有个四周竹木映翠，门前小溪流淌的村庄，这就是我县第一个建立党支部和村苏维埃政府的白柘洋村。这里不仅环境幽美，还有其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1933年，叶潘、张老一率领闽东游击队到我县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其中一个中心点就是白柘洋村。这里距寿宁县境只有5里。当时的福（安）寿（宁）中心县委在我县边境建立了官塘区委、白柘洋区委，白柘洋村建立了我县第一个党支部和村苏维埃政府，胡正理任支部书记兼村苏维埃主席。仿照闽东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白柘洋村苏维埃由7个委员加主席组成，即肃反、土地、军事、财政、文化、粮食、交通等委员，群众简称“七部委”。为了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白柘洋人民在村周围的桥头岗、灯盏凹、长岗、岙后、乌际头、后际头、山鸡埕等山上和要口搭了山棚或哨所，供游击队及家属宿营和站岗放哨。这里成了安全地带，原闽东特委、红军独立师叶飞、范式人等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住过。

白柘洋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当地反动恶霸的极大恐慌。以吴纯仁、吴一平为首的反动乡、保长及土豪劣绅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他们联合逃避在县城的反动乡、保长、豪绅，组成所谓“东乡难民代表”联名向国民党省、专署、县三级政府控告，请求派兵进剿，并积极为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充当向导，做地头蛇。

1935年10月，浙江省保安团400多人在当地反动势力配合下，围攻我浙闽边区革命根据地，以烧、杀、抓、并（村）来摧残老区人民。白柘坑、乌际头等小村被并入江根乡后洋、杉坑等村。群众被强行赶走，有的只好隐姓埋名到邻村避难。但由于群众的支持，红军游击队仍在白柘洋一带活动。11月间，游击队从景宁县蒼下抓来两个女土豪关押在白柘洋村。女土豪以一担白银相许，收买歹徒两次送信搬兵来救她们。后一封信虽被队长张老一截回，将女土豪作了转移，但前一封信已送到敌人手里。27日，国民党保安团再次包围了白柘洋村，将全村群众赶到一个空坪上，威胁群众说出女土豪的下落。群众坚不吐实，无人开口。傍晚，敌人抓走了胡正理等42名男性村民，押到官塘村关在仙宫，同时还抓了官塘乡苏维埃主席吴先模。

第二天下午3时，敌人在官塘村桥头坪枪杀吴先模后，又将白柘洋村抓去的群众押回本村。这时，党支部书记、村苏维埃主席胡正理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想以牺牲自己来保护全村群众，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大声对敌人说：“我是村主席，要杀就杀我一人。”敌人先杀害了胡正理，接着杀了从身上搜出资助红军物资清单的吴先杰和为红军伤员治伤的土医吴先治。游击组长吴先振、“七部委”成员吴先锦、吴志先被捕入狱。后吴先振惨死狱中。吴先锦、吴志先到国共合作抗日时出狱。

1936年2月，官塘乡地霸吴一平派爪牙探知游击队仍在白柘洋活动，率民团连夜偷袭，包围了红军交通员张正花、吴其凤的房子。正在房里的游击队长张老一跳窗脱险，游击队员陈国瑜、交通员张正花当场被杀，并割去头颅。

血腥的镇压没吓倒白柘洋人民。他们清除了村中的败类后，依然积极地支持红军游击队活动。1936年秋，浙闽两省敌人再次围攻浙闽边革命根据地。闽东特委宣传部长、独立师政治部主任范式人，带领40多名红军在乌际头山上隐蔽40多天；游击队长叶潘及妻子在山鸡垵山上隐蔽10个多月，全仗白柘洋人民掩护和支持。群众为他们传送情报，搭棚住宿，购买米、盐和军需品，选派可靠的老人和小



石抹宜孙在庆元的 最后搏斗

——发生在元明交替的历史事件

吴 升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一月，吴国公朱元璋已攻下了婺州（金华）和衢州，命耿再成和胡大海分兵合攻处州。当时元处州守将石抹宜孙（舒穆鲁伊逊）派元帅叶琛守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守葛渡，镇抚陈仲实和照磨陈安守樊岭，元帅胡深守龙泉。不久，右司郎中刘基看到将士怠弛，民心涣散，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就弃官归家，而元帅胡深也弃军降吴，这使石抹宜孙失去了得力助手，势孤力弱，抵不住耿再成和胡大海的联合进攻，连失桃花岭、葛渡二岩，吴军进逼城下，石抹宜孙出战，败绩，弃城由青田逃入闽中，吴军遂克处

该陪伴游击队家属在山上隐蔽。敌人明知山上有红军和游击队，可是在这茫茫的深山中，那里去找？最后只得放火烧山了事。原中顾委委员范式人生前回忆这段历史时，无限感慨，深情地写下了“悼念庆元的先烈为闽浙边革命斗争的业绩，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的功绩。”的题词。

在革命战争年代，白柘洋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和支援了红军游击队。解放后，他们继续发扬战斗年代的斗争精神，用辛勤的双手建设自己具有光荣历史的家乡。1987年春节前夕，县委书记兼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徐培金，带着有关部门同志，冒着纷飞的大雪，代表县委、县府到白柘洋村慰问，向老区人民赠送慰问品，在慰问大会上，徐培金书记赞扬了白柘洋人民崇高的献身精神，热切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立功！以此来告慰牺牲在白柘洋的革命烈士，让烈士的英灵含笑九泉。

州。然后由胡大海部将缪美分兵到所属各县安抚百姓。

次年，即至正二十年(1360年)六月，石抹宜孙在闽中收拾残部，补充兵力，欲图恢复，但也看到形势已十分不利，见事已不可为，叹曰：“处州，吾所守也，今吾势穷无所往，不如还处州，死为处州鬼耳！”于是，就率部进入庆元，此时庆元虽已属吴，事实上是一个处于阴阳界上的空白区，西、南均与福建陈友定属地邻接，县官还没有派来，地方上无人管理，各乡都是由胡深守龙泉时所组织的义勇乡兵来维持地方事务，没有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政。所以石抹宜孙进入庆元，基本上是没有遇到阻力。可是，从庆元攻入龙泉边境时，就遇上了耿再成的部队，发生了激战，石抹宜孙被打败，逃至竹口，想仍回到福建去，路过菊隆区的桃坑(史书误作桃花坑)，却遭到乡兵的袭击，石抹宜孙被杀死，其部将李文彦收抢其尸体折回绕道至庆元城，将其藁葬于喜鹊坳附近，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将军坟”。后来朱元璋认为他尽忠死事可嘉，遣使祭之，以礼迁葬于龙泉，留这坟堆为衣冠冢，在1971年时因水利建设被开挖，坟内尚有甲衣残片及铜质掩心镜一块，可惜当时无人敢过问，竟被农民作废铜送合作社收购。

此后，朱元璋为了对付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陈有定等，连年混战；同时金华、处州又先后发生了苗军元帅蒋英和李佑之叛变，杀死了胡大海和耿再成，局势十分紧张，亦无暇顾到边界地区的地方治理工作，这样庆元就长期处于混乱的状态中。特别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五月，吴参军胡深进兵攻克松溪，征集庆元乡兵参加浦城决战，曾惊动全县，至今庆元还留下以五月初四为端午节的遗俗，直到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撤销庆元县制，改设巡检司于查田，地方才逐渐稳定下来。

(接第8页)

全年客运量173.67万人次，客运周转量6873.64万人公里。

回顾建国38年来庆元交通运输事业，成绩是显著的。展望今后，在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指引下，交通运输战线的成果将会更加辉煌。

庆元地处浙闽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长期以来交通闭塞,羊肠小道遍布全境,虽是瓯、闽、福安三江发源地,但由于溪水流量小且落差大,溪间巨石累累,全县除竹口区曹岭水运可通瓯江,新窑竹筏可通闽江外,其他各地舟楫不通,物资交往均靠肩挑背运。虽然历代民间为了加深邻县来往,逐步进行了县道建设,把泥泞小道建为石铺路面,但除庆元至松溪的县道较为平坦外,其余如到景宁有乔陌岭。到龙泉有上庄岭,到寿宁有梅树岭、半天岭,到政和有林腰岭。且这些岭又陡又高,所以当时奔波在这些县道上的挑伕,曾编了这样一首歌谣唱出自己身受的艰辛:

“上岭脚骨酸,落岭脚骨疼,赚来不够供养老婆。”人们为了改变这种闭塞状况,民间曾相继成立了修路组织——路会、桥山。但在过去那种文化不发达,经济落



庆元交通概述

——刘化涛

后,统治者又不重视的情况下,当然是难以办到的,至民国二十一年,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兴建龙庆公路(见《浙江百年大事记》),其中小梅至庆元段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修通。但路基很狭窄,宽处仅有5m,窄处象新窑岭仅1.8m,还有1.3处木栈道,故纵有公路也只能勉强通小车。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日寇侵占金华、衢州,六月丽水沦陷,国民党浙江省政

府的部份机关因要撤退到庆元,才临时加宽新窑岭一段以供小包车与无拖斗的货车行驶。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国民党政府虽然再次拓宽龙庆路线,但那也只不过是让那些达官显要的小汽车更好通行,民间客货运输仍然不通。所以解放前的修路,除了给人民增加征工,征料的沉重负担外,并未带来任何好处。

建国后,为了迅速恢复庆元经济,发展生产,县人民政府即着手

修复和拓宽龙庆公路。1953年8月成立了以副县长赵长辉为主任的“庆元县龙庆公路修建委员会”，进行全线修复拓宽工作，到1954年3月底基本完工。4月6日由赵长辉主持剪彩典礼，宣告龙庆路自即日起全线通车。

继龙庆公路通车不久，1956年初开始修建菊（水）隆（宫）公路。为了加强领导，1957年1月成立“庆元县菊隆公路建筑委员会”，以县长赵长辉为主任，姚洲、程达鹏为副主任，负责菊水至隆宫、蓬桥至安溪23公里公路的建设工作。于1957年12月完成，1958年1月通车。

1958年开始三年的“大跃进”，同年11月庆元并入龙泉县。在“大跃进”年代，国家建设对木材、毛竹的需求量激增，从外县调入的采伐工人最多时达1万余人，分设9个伐木场，其中庆元片设4个。要把大批木、竹运出去，开辟公路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早在并县前的1958年2月，就着手建设庆元到五大堡和柏渡口到上济两条公路。建设初期技术工人都是从外地招收的。为了实现县委提出的“苦战五年，实现交通化”的号召，县人委于同年4月作出决定，从修建庆（元）五（五大堡）公路的官塘等17个乡民工中抽调417人培养开山工，条件是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身体好，思想进步、服从领导的农村积极分子（未到齐）。并县后，这批工人在搞四源“钢铁大会战”中，被调往建设查（田）源（四源）公路。以后有一部份在建设龙泉南大桥时由省交通厅工程局的建桥工程队接收，另一部份是龙泉县公路工程队的骨干力量。在这个时期竣工的公路有：庆元至五大堡19公里，柏渡口至上济12公里，分别在1959年10月和1960年2月通车。此后在调整时期的三年中，暂停了开辟新的公路。

1963年开始到1966年，龙泉县委和县人委先后部署建成的公路有：五大堡至荷地、隆宫至源头（矿区）、黄坑至铁岭、安溪至后山桥、新窑到松溪以及垟砦到朱黄等6条。由于1966年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建设受到影响，到年底仅修通五大堡向荷地延伸7公里，隆宫至源头12.57公里，黄坑至铁岭1.17公里，

安溪至后山桥1.32公里。

在“文革”时期(1967—1976),开工项目虽有11条,大多中途停工,实际竣工里程仅76.731公里,主要是新窑到松溪界8.03公里(其中县境内1.03公里、续建坪磬到朱黄14公里、安溪到吾际下10.77公里、五大堡到荷地19公里、杉树湾到黄淤14.451公里、上济到劳武8.78公里,平均每年竣工不到8公里。

1975年8月恢复庆元县(国务院批准是1973年7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庆元的交通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1977年至1983年7年期间,共新建和续建公路33条(段),通车里程270.36公里,平均每年竣工通车38.62公里。从而庆元作为浙江省唯一的一个县出席全国县乡公路建设交流经验会。1984至1987年底续建完成公路4条,通车里程43.192公里。到目前为止全县通车里程达501公里(不含由本县建设属松溪管辖的5.34公里)。全县3.8个乡镇已有35个通车,山坑、斋郎两乡公路正在兴建,明年可望通车。全县通车行政村177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52%。並在新村区交溪口与竹口区的曹岭建立了2个水运站。现在以公路为大动脉,连结拖拉机路和乡村便道的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东、南、西三面为通福建的寿宁、政和、松溪,东北连景宁,北接龙泉,可谓四通八达。

随着公路建设的发展,客货运输也日益发展。1954年龙庆公路通车时,使用的是木炭车,龙泉到庆元要一天时间,乘客寥寥,客车前半段坐人,后半段装货。1973年仅庆元医院有1辆救护车,公路段1辆料车。1986年底已有各种载重汽车199辆,1145吨位,除庆元车站16辆外,均为县属各单位车辆。1986年货运量165,726吨,货运周转量3477.64万吨公里,还有拖拉机700余台。

客运方面,每日有班车直达丽水、温州、衢州、南平及龙泉、松溪、政和、景宁等邻县,至寿宁客运也将开辟。县内容运设有137个站(包括停靠站)。每日从庆元开出的班车有:庆元到达四山、中村、源头、三济、黄真、小梅、万里林、杨楼、龙溪、东溪、八炉、交溪口、苏湖、官塘、竹坪、江根、淤上等地。1986年底拥有大客车28辆,其中个体户2辆。1130座。各种小汽车50辆,特种用车16辆,摩托车35辆(不包括私人车)。(转入第5页)



我所知道的

国民党党政军关系

——郑可建

我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青年时期适逢国难临头，跟随国民党部队混了好几年，也在国民党政府干过行政工作，最后是任庆元县自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我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时由国民党中委黄绍竑、许绍棣介绍，直接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申请甲种入党的。但一直设有参加基层组织，更谈不上过党的生活。那时国民党的部队没有党的组织，在军事教育机关里，营、连一级虽设有政治指导员，但不是党组织。黄埔军校初期虽设有党代表，有特别党部，但下面也无分支机构。以后由政治部代替党代表，下面同样不设基层，一切事务均由军事首长一元化领导。

国民党的军官，除了黄埔毕业的蒋介石嫡系都是国民党员外，一般行伍出身的军官就不一定是国民党员，士兵更不用说了。在军校里入伍生未参加国民党的都要履行集体入党手续，至于部队里不管野战部队还是地方部队都没有必须入党的规定。

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与党部各自有直接上司，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县长多为外县人，书记长多为本地人，但县长碍于地方势力，上任时不得不先拜“地头蛇”。至于以后是不是合作得好，那得由双方的利害关系而决定。县长一般都是国民党员，但不参加县一级党组织生活。一般行政人员，甚至科局长，不一定是国民党员。县府虽设有一个直属区分部，但从来没有开过会，也不曾以党的名义进行过什么活动，仅具形式而已。

县党部名为监督政府推行政令，实际上以防止所谓“异党活动”为专责，有时为了利益冲突，还要钻政府的空子，闹别扭。只有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就是为适

应这种需要而搞起来的组织形式。

“党政军联席会议”(不称党政汇报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是国民党党与政府合组的一个机构,建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的时候。它的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在解放战争初期如办理共产党员自首登记等。后期则调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研究如何破坏、迫害、甚至逮捕审讯等。还有凡属县级各部门涉及治安的事务它都有权处理。这个“联席会议”不属国民党中统局,也不属军统局,是一个最高组织,但又不是行政最高组织,表面是个会议,实质是个实体。对内有其独立性,对外则借县府名义行使它的职权。开会时由县长任主席,参加成员有县党部书记长、县警察局局长、地方部队首长;必要时还请有关部门的亲信党员负责人列席(本刊二期逸夫“国民党党政关系”一文引吴醒耶同志追述有法院院长与首席检察官为当然参加者,我所知道的却没有)。“联席会议”设专职会报秘书一人,处理日常事务。会报秘书不同于县府的一般秘书,近似“机要秘书”或“特务秘书”一类,以县府以其他公开职务加以委任。如民国三十六年间庆元会报秘书吴绫就是以县自卫总队少校总队附的名义来办理会报工作的。也可以编制内的秘书或助理秘书来兼办。

“联席会议”没有横向联系,只有直线联系。会报秘书的下属各县设置不同,有的设乡镇情报员,一般由乡镇事务员兼,从中挑选骨干,任命为谍报员。吴绫任庆元会报秘书时,就委任了八名情报员,其薪给就在县自卫总队拨八名士兵名额支付,由会报秘书直接指挥、联系,总队部不予过问。

“联席会议”开会不定期,由会报秘书提请,主席召集。开会时由会报秘书汇报执行上次决议情况、目前动态与讨论下阶段工作,由会报秘书记录。会议决议通过政府用“机密”字行文贯彻。特别文件如上对省级联席会议下对特定关系人,则以特定印信行文。各县“联席会议”都有一个特定代号,如对省用“余肃纲”,对下用“赵××”,刻有印章,是代表机关的印信,外人以为是私人信件。代号随时变换,事先通知对方。参加会议的成员签到时也用代号,由自己临

青瓷是我国著名传统瓷器的一种，始于唐而盛于宋，其最负盛名的产品，唐代有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的“越窑”；五代时有河南郑州一带的“柴窑”；宋代有浙江杭州凤凰山、乌龟山的“官窑”、河南汝临的“汝窑”、陕西铜川市黄堡镇附近的“耀州窑”以及浙江龙泉小梅镇的“龙泉窑”等。

“龙泉窑”青瓷是继承“越窑”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它以土质细腻、釉水青翠、色泽晶莹而闻名于世。

近些年来，在庆元境内也发现有大批青瓷古窑址，这与“龙泉窑”青瓷的历史渊源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庆元是在南宋宁宗庆元三年析龙泉县地建置的，而龙泉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析松阳、遂昌两县地建置的，追

流溯源，
800年前
龙泉、庆元
两县本是一
家，所以庆



追源溯流

话青瓷

——克冲——

元古瓷窑的历史也就是龙泉窑的历史，这些古青瓷窑址的发现，无疑

为研究龙泉青瓷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到目前为止，庆元境内所发现的古青瓷窑址有28处之多，且全部都是集中在本县新窑与龙泉小梅一溪之隔的桐山一线。根据各窑址出土的古瓷经省考古所鉴定，其中有唐代古窑一处（在黄新乡黄坛村），北宋古窑六处（在三坑乡上垵村），南宋至元朝古窑十一处（在三坑乡上洋村），元朝至明朝古窑六处（在竹口镇竹口村），明

时行用，与会者一看就明白。文件只经主席过目，县府主任秘书无权过问。从收文到拟办、判行、缮写、盖印、封发、归档、保管统由会报秘书一手经办，任何人不得调阅。

此外，还有一个县动员戡乱委员会。也是党政联合组织，是一个联合反共的设计、执行机构，不过还吸收了地方人士与有关单位领导参加，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开反共组织（本刊第1期已有介绍），与党政军联席会议的绝密性质是有原则区别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朝古窑二处（在黄新乡新窑村），明末清初古窑一处（在三济乡下济村），清朝古窑一处（在黄田乡高畈村）。其中唐代古窑及北宋古窑群的发现，不但可与明王世贞《宛委余编》及《辞源》注释中“北宋处州龙泉县旧有龙泉窑”一语互相印证，也进一步证实了龙泉青瓷生产“盛于宋”的说法。更其重要的是唐代古窑的实迹足可以纠正诸家向来认为龙泉窑“源于五代”说法的误谬。

在析龙泉地置庆元的当时，两县分界如何？因两县在明正统以前的县志均早佚，无可查考，然在其他一些文献资料中尚有蛛丝马迹可寻，雍正版《浙江通志》引《龙泉县志》说：“龙泉昔产窑器，青瓷窑昔在琉田、道泰、大其洋……，瓷窑昔属剑川，自析乡立庆元县，窑地遂属焉，近亦窑户稀绝矣”。且自明洪武三年撤销庆元置巡检司后，治所设在查田，又把小梅一带与庆元的大片区域（除新村、荷地两个区的大部份）划为巡检司辖地。庆元复县后，县界又经多次变动，致使原来“龙泉窑”的一些重要产地也跟随改域的变迁而屡更隶属。所以清梁章钜《浪迹续谈》说：“龙泉窑出龙泉县，以绿色匀净，裂纹隐隐，有朱砂底者为佳。自析置龙泉入庆元县，窑地遂属庆元，去龙泉几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瓷窑，仍称龙泉，亦可笑也”。这虽牵涉到“名”与“实”的问题，但要知道，“龙泉窑”青瓷是因原产于龙泉而得名，它不能以产地的辖属变动而受到影响，也就象各地饲养的萧山鸡一样，你不能引到龙泉就改称“龙泉鸡”，引到庆元就改称“庆元鸡”。这才真是名实混淆，更将可笑。

龙泉窑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是因为它在青瓷同类中既具有一般的共性，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明陶宗仪《辍耕录》与清程哲《窑器说》对龙泉窑的评论所说，龙泉窑“土细质厚，色甚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清朱琰《陶说》云：“唯哥窑质量耐藏。”当然，在各类青瓷中，它们也与龙泉窑一样、各有千秋，互显其长。比如，柴窑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越窑则以其“产秘色瓷器为宫廷供物”而著名。因此，我们对于各类青瓷的特点就不能混为一谈，假若张冠李戴，势必又在名实问题上造成混乱。

庆元古青瓷窑的发现，其历史完全是属于龙泉的，再进一步说，